主观贫困对个体延迟满足的影响及其中介因素

徐富明 黄 龙 傅安国

摘 要: 2020 年我国全面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过相对的主观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观贫困是否像客观贫困一样会影响个体的延迟满足和行为偏好尚未可知。我们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探讨了主观贫困与个体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了在两者之间起关键作用的中介因素。结果发现: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控制感和执行功能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控制感、执行功能与延迟满足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感与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链式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 主观贫困;延迟满足;执行功能;控制感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4)05-0165-07

一、问题提出

延迟满足是指为获得未来较大收益而抵制当前较小收益诱惑的坚持过程。[①]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处于长期贫困之中人们的延迟满足能力较低,经常出现短视行为,不能为了未来更大的收益而抵制即时的较小收益的诱惑。这种短视行为又会进一步导致个体收入的降低,陷入“贫困——短视行为——继续贫困”的贫困陷阱之中。[②]2020 年我国虽然全面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过相对的主观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客观贫困者会因为基本的物质需求未被满足而产生主观贫困的感觉,而客观上非贫困者也经常会因自己更高的需要没有得到足够的满足,而产生主观贫困的感

作者简介:徐富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心理学博士;黄龙,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傅安国,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心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71103、72164028、32160200)、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孵化)项目(AHSKF2021D21)、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MS048)和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项目(2022AH03019)的阶段性成果。

① Mischel, W. Processes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4, 7: 249-292.

② 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破解世代贫困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3 月 5 日。

觉。因此,无论个体客观上是否真实贫困,当个体认为自己“拥有”的金钱少于“需要”时,就会产生主观贫困的感觉。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被认为都会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认知、选择和行为。[①] 那么,在我国全面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背景下,主观贫困是否也会导致个体延迟满足能力的下降,其内在心理机制如何?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国制定干预对策来应对主观贫困带来的不利后果,阻断人们因主观贫困导致延迟满足能力下降,进而陷入客观贫困之中,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提供助力。

二、相关文献分析与述评

(一)生命史理论

对人类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解释都应放在进化的框架里才更有意义。[②] 进化生物学的分支——生命史理论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体所面临的资源都是很有限的,所有生物体都面临着如何将这些资源分配到各种增强健康的活动中的问题,他们需要权衡优先做哪些增强健康的活动。[③] 具体到人类,一个人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反映了他的生活史策略。生活史理论将人们的生活策略分为快策略(faster strategies)和慢策略(slower strategies)。[④] 慢策略者往往是长期规划者,他们愿意推迟即时满足,以增加未来的回报。相比之下,快策略者往往是短期机会主义者,他们接受短期利益,很少考虑长期后果。[⑤]

使用快策略还是慢策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感受到的自己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即控制感。控制感是指相信自己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生活。[⑥] 控制感是个体采用何种生活史策略的关键心理驱动因素。已有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控制感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控制感更低。[⑦] 而缺乏控制感会导致个体采用更多的快策略,满足自己即时的需要,而不是延迟满足自己。[⑧] 生命史理论并没有对两种策略进行明显的好坏区分,两种生命史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下均有其合理性。[⑨] 当个体面临不可控的、恶劣的环境,个体无法确定未来的回报是否能够实现,此时个体更应该采用快策略,因为这是对个体生存最有利的策略;而当个体面临可控的生存环境,个体能够确定未来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此时个体更应该采用慢策略,延迟满足自己的当前的需要,等待未来更大的收益。[⑩]

由此可见,贫困与非贫困个体在控制感上的关键差异驱动了个体是否延迟满足自己的需要,采取快或慢的生活史策略。鉴于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会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认知、选择和行为。[⑪]

---

① 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Henry Holt, 2013.

② Hammerstein, P., & Hagen, E. H., The Second Wa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Biology,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05, 20(11): 604-609.

③ Kaplan, H. S., & Gangestad, S. W., Life Histor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D. M. Buss (E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w York, NY: Wiley, 2005, pp. 68-95.

④ Ellis, B. J., Figueredo, A. J., Brumbach, B. H., & Schlomer, G. L.,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Human Nature*, 2009, 20: 204-268.

⑤ Griskevicius, V.,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 Tybur, J. M.,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productive T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1, 100(2): 241-254.

⑥ Gurin, P., Gurin, G., & Morrison, B. M., Person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Social Psychology*, 1978, 41: 275-296.

⑦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763-773.

⑧ Griskevicius, V., Ackerman, J. M., Cantu, S. M.,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Simpson, J. A. et al., When the Economy Falters, Do People Spend or Save? Responses to Resource Scarcity Depend on Childhood Environm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2): 197-205.

⑨ Caudell, M. A., & Quinlan, R. J., Resource Availability,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A Path Analytic Approach to Global Life-history Variation, *Human Biolog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Human Biology Council*, 2012, 84(2): 101-125.

⑩ Ellis, B. J., Figueredo, A. J., Brumbach, B. H., & Schlomer, G. L.,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Human Nature*, 2009, 20: 204-268.

⑪ 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Henry Holt, 2013.

据此提出假设 1:主观贫困影响延迟满足——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二)稀缺理论

稀缺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处于贫困之中个体的一些行为和决定。稀缺理论认为贫困通过来自两个核心心理机制(管窥和认知负荷)影响决策与行为。首先,稀缺会导致注意力集中在解决贫困的相关问题上,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记忆编码。而对于贫困不相关问题的注意力忽视则会导致健忘、疏忽和过度借贷行为。这种注意力集中和忽视的过程也被称为"管窥(Tunneling)"。第二,对稀缺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会形成带宽负担(bandwidth load,认知负荷的一种隐喻表达),降低了心理带宽(mental bandwidth),导致个体认知能力(个体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个体抑制行为和控制冲动的能力)的降低,进而无法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① 一些已有研究也支持稀缺理论中的心理机制。例如,Mani 等人在 Science 上发表的研究发现被试的认知能力与经历财务困境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他们在解决财政困境时的认知功能出现短暂的降低。② Carvalho 等人进一步区分了长期和短期的经济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的财务稳定与等待更高收益的意愿以及抑制控制能力的提高有关。人们在发薪日前后这种临时的经济状况变化下,也表现出在发薪日前比发薪日后更多的偏好当下。③

自我控制理论认为个体是否能延迟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等待未来较大的收益反映了个体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④ 即时收益选项是妨碍个体获得未来更大收益的诱惑物,会诱导个体放弃未来更大的收益。但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而等待未来更大的收益。一旦个体的认知控制资源受到损耗,认知控制能力出现下降,就会导致个体无法抵制诱惑,从而表现出冲动和直觉行为。⑤ 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通过 Stroop 任务诱发的高认知损耗会导致个体在随后的跨期选择任务中更多地选择即时的较小的收益。而且,高认知损耗者比低认知损耗者的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弱,当个体面临诱惑时,它们无法对皮层下组织结构(如伏隔核)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就无法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⑥

综上所述,贫困可以通过注意力、认知负荷等方式影响个体的执行功能,暂时性地降低个体的认知功能,导致他们无法抑制即时满足的诱惑,表现出较低的延迟满足能力。据此提出假设 2:主观贫困影响延迟满足——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某省属高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329 份,回收问卷 1329 份,其中 220 份数据完成时间过短(长)或所有题目选择了同一选项,我们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剔除了该部分样本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 1109 份(男生 469 人,女生 640 人,$M=19.81$,$SD=1.18$)。

(二)研究工具

1. 延迟满足量表

采用延迟满足量表(Deferment of Gratification Scale, DGS)评估人们抵抗即时收益诱惑,而等待更

① 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Henry Holt, 2013.

② 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 Zhao, J.,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2013, 341 (6149): 976-980.

③ Carvalho, L. S., Meier, S. et al., Poverty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Changes in Financial Resources at Payda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260-284.

④ Ainslie, G., Specious Re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Impulsiveness and Impulse Contr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5, 82: 463-496.

⑤ Vohs, K. D., The Poor's Poor Mental Power, *Science*, 2013, 341: 969-970.

⑥ 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沈汪兵:《自我损耗促进冲动决策:来自行为和 ERPs 的证据》,《心理学报》2014 年第 10 期。

大、更晚收益的延迟满足能力。该量表包括两个影响选择等待未来更大收益行为的因素:控制冲动、计划和等待。[①] 该量表共包含 12 个项目,其中 6 个项目是积极的(正向计分),例如,"我擅长存钱";6 个项目是消极的(反向计分),例如,"我同意这个观点:吃喝玩乐,因为明天我们可能都会死"。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总均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越强,越愿意等待未来更大的收益。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75。

2. 主观贫困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 Griskevicius 等人的资源可用性感知量表。[②] 共包含 10 个条目,用来测量参与者对金钱稀缺的感受。条目包括:"现在,我有足够的钱买我想要的东西"、"我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等。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7"代表"完全符合"。其中 4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6 个条目为正向计分。总均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观贫困感程度越高。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5。

3. 控制感量表

采用 Lachman 和 Weaver 编制的控制感量表,[③]用来测量个体感知到的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程度。共包含 5 个条目,其中 3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2 个条目为正向计分,如:"只要我下决心做的事,我就能把它做好"、"对于我想做的事情,我总能够找到方法并顺利完成"和"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大多数都由他人决定。"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5"代表"完全符合"。总均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控制感越强。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61。

4. 执行功能量表

采用简版执行功能的行为评定量表(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 Adult Version, BRIEF-A),原量表包含了 75 个条目,使用 9 个从理论和经验上都没有重叠的临床子量表来测量执行功能的各个方面。[④]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包含 32 个条目简版执行功能评定量表,旨在测量人们的元认知能力,包括元认知指数的四个子量表,1)行动能力,反映了个人开始一项任务或活动的能力,以及独立产生想法、响应或解决问题的策略的能力;2)工作记忆,是指为了完成一项任务、编码信息或制定目标、计划和实现目标的连续步骤而将信息保存在大脑中的能力;3)计划和组织能力,衡量个人管理当前和未来任务需求的能力;4)任务监控,反映了一个人跟踪解决问题的成功或失败的能力,以及在行为过程中识别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例如,"我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有困难"或者"我不会提前为将来的活动做计划"。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法,1="总是有问题",7="从来没有问题",分数越高说明执行功能越好。除了 32 个选项外,我们还增加了 1 个重复内容、颠倒措辞的选项,以检查是否存在默许偏差。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5。

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ocio-Economic Status,SES)作为测量大学生客观贫困状况的工具,参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9 和袁晓娇等人的计算方法来测量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⑤] 参

---

① Ray, J. J., & Najman, J. M.,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Deferment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6, 126(1): 117-119.

② Griskevicius, V.,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 Tybur, J. M.,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productive T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1, 100(2): 241-254.

③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763-773.

④ Roth, D. E., Martz, P., Yeo, R., Prosser, C., Bell, M., & Jones, A. B., Are National Vitamin Guideline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dequate Blood Levels in Children?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5, 96(6): 443-449.

⑤ 袁晓娇、方晓义、刘杨、李芷若:《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与者需要对自己家庭中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拥有物数量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报告。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赋值,其中,父母文化程度按照中国各学历教育的具体年限,参考 PISA 所用标准进行赋值,①具体为:小学未读完赋值为 3 分,小学赋值 6 分,初中赋值 9 分,中专/高中等赋值为 12 分,专科赋值 15 分,大学及研究生以上赋值 16 分。父母职业参考李春玲编制的职业声望指数并结合调查内容进行赋值,②分值在 1-10 分之间。参与者还需要报告自己家庭中是否拥有电脑、独立的房间等 11 种家庭财产资源,每有一项计 1 分,总分在 0-11 之间。这三个变量的得分通过计算得到一个 SES 的综合得分。具体公式为 $SES=(\beta_{教育程度}*Z_{教育程度}+\beta_{职业}*Z_{职业}+\beta_{家庭拥有物数量}*Z_{家庭拥有物数量})/E$,其中,β 值为每个变量的因素负荷,Z 值为每个变量的标准分,E 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SES 得分越低,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客观金钱稀缺程度越高。

(三)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3.0 进行标准分计算以及因素、主成分、相关分析等,采用 Mplus 软件对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四、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采集到的数据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1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6.14%,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③

(二)相关分析

在统计了年龄、性别、年级、专业和家庭 SES 后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由此表可知,执行功能、控制感和延迟满足相互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主观贫困与执行功能、延迟满足三个变量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 1　主观贫困、延迟满足、控制感及执行功能之间的相关分析

	M	*SD*	主观贫困	控制感	执行功能	延迟满足
主观贫困	3.91	0.98	1			
控制感	3.37	0.53	-0.23***	1		
执行功能	4.65	0.89	-0.23***	0.57***	1	
延迟满足	4.66	0.74	-0.17***	0.36***	0.47***	1

注:*** $p<0.001$

(三)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Mplus 做结构方程模型④检验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主观贫困对延迟满足的直接作用,模型拟合指数为 RMSEA=0.000,SRMR=0.000,CFI=1.00,TLI=1.00,模型拟合良好,主观贫困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延迟满足感($\gamma=-0.13$,$t=-4.97$,$p<$

① 占盛丽:《从个人和学校视角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启示》,《上海教育科研》2009 年第 12 期。

②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③ 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012 年第 5 期。

④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5 期。

0.001)。其次,对控制感和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因素进行链式中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该模型拟合指标为 RMSEA=0.000,SRMR=0.000,CFI=1.00,TLI=1.00,模型拟合良好。如图 1 所示,主观贫困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控制感($\gamma=-0.23$,$t=-7.18$,$p<0.001$),控制感正向预测延迟满足感($\gamma=0.13$,$t=3.35$,$p<0.01$)。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见表 1。控制感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的区间为[-0.014,-0.034],不包括 0,中介效应值为-0.030,中介作用显著。因此,控制感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主观贫困负向预测执行功能($\gamma=-0.10$,$t=-3.62$,$p<0.001$),执行功能正向预测延迟满足($\gamma=0.38$,$t=10.65$,$p<0.001$)。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的区间为[-0.052,-0.024],不包括 0,中介效应值为-0.038,中介作用显著。因此,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控制感又正向预测执行功能($\gamma=0.55$,$t=22.34$,$p<0.001$)。因此,执行功能在控制感与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95%的区间为[-0.046,-0.045],不包括 0,中介效应值为-0.048,链式中介显著。因此,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链式中介的作用。此外,在此模型中主观贫困不再显著预测延迟满足($\gamma=-0.05$,$t=-1.69$,$p=0.091$)。综上可知,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完全的链式中介作用(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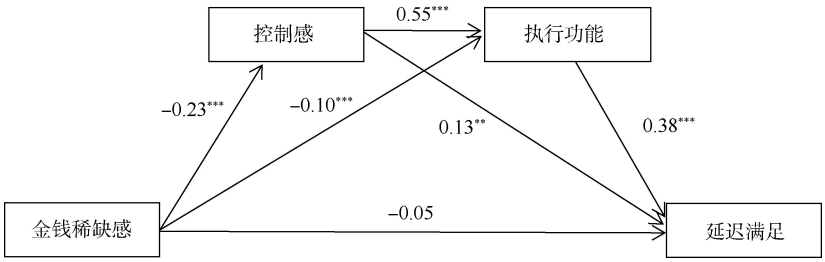


图 1　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的关系模型图

表 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和效应值

中介路径	效应值	区间(95%)
主观贫困→控制感→延迟满足	-0.030	[-0.014,-0.034]
主观贫困→执行功能→延迟满足	-0.038	[-0.052,-0.024]
主观贫困→控制感→执行功能→延迟满足	-0.048	[-0.046,-0.045]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家庭 SES 等变量之后,主观贫困、执行功能、控制感和延迟满足相互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证实了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当个体感受到自己处于贫困之中,其更难以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很难坚持等待未来较大的收益而且这种关系在控制了家庭 SES 之后仍然成立。由此可见,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能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超出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主观贫困能够独立地对延迟满足能力产生影响,降低个体延迟满足的意愿。此外,相关分析还发现主观贫困与控制感、执行功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控制感与执行功能、延迟满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执行功能与延迟满足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已有研究发现控制感与人们的主观经济状况显著相关,个体的主观经济状况越低,其控制感

就越低。[①] 更低的控制感意味着个体会更偏好即时满足,无法坚持等待未来更大的收益。[②] 而执行功能的发展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③]也被发现与延迟满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④] 由此可见,控制感和执行功能是主观贫困和延迟满足的重要相关变量。

更为重要的是,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控制感和执行功能是主观贫困和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变量,而且在加入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后,主观贫困不再能预测延迟满足。由此可见,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在主观贫困和跨期选择之间起完全的链式中介作用。即主观贫困会导致个体的控制感和执行功能暂时性下降,进而丧失追求未来更大收益的动机,以及抵制即时满足诱惑的认知控制能力的不足,最终导致个体延迟满足的下降。这与生命史理论[⑤]和稀缺理论[⑥]所提出的客观贫困影响延迟满足的心理机制相符合。不过,以往理论的焦点仍然是客观上的贫困,而不是主观贫困。已有的理论模型都只强调了心理机制中某一个类别的个别心理因素,我们的研究从认知和动机的角度同时纳入执行功能和控制感这两个关键心理因素构建了新的心理机制模型。

此外,由中介模型图可知,主观贫困主要通过主观贫困→控制感→延迟满足、主观贫困→执行功能→延迟满足、主观贫困→控制感→执行功能→延迟满足这三条路径来间接对延迟满足产生影响。这表明控制感和认知功能不仅单独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关键的中介作用,而且控制感和认知功能也会相互影响。即控制感可以通过对执行功能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延迟满足。流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现象。[⑦] 流程模型认为个体无法抵制诱惑,可能是个体由于动机取向的转变导致个体不愿意调取足够的执行功能来抑制冲动和当前的诱惑。即当个体控制感下降,发现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时,他们就不愿意再调用足够多的认知资源和执行功能来处理这些任务了,即使此时他们仍然有丰富的认知资源可调用。由此可见,控制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在任务中执行功能的投入程度或对自己执行功能的主观评价,从而影响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

基于本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和控制感在主观贫困与延迟满足之间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那么对个体执行功能和控制感的提升或干预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主观贫困对延迟满足的不利影响。例如,通过自我肯定来提高贫困者的控制感,从而使他们更愿意等待更大的回报。[⑧] 通过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来提高个体的执行功能,[⑨]从而改善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未来可以在我国全面解决绝对贫困背景下,开展更多的针对主观贫困者的控制感和执行功能干预研究,从而提高主观贫困者的延迟满足能力,为政府和研究者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管理对策提供心理学支持。

(责任编辑:子聿)

---

① Choi, J., Kang, S. H., & Lee, M. J., The Sense of Control, Perceive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Korea Observer*, 2020, 51(3): 391-409.

② 宋锡妍、程亚华、谢周秀甜、龚楠焰、刘雷:《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确定感和控制感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报》2021 年第 5 期。

③ Cartwrighta, K. B.,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Executive Function for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Early Education & Development*, 2012, 23(1): 24-36.

④ Esopo, K., Mellow, D., Thomas, C., Uckat, H., & Haushofer, J., Measuring Self-efficacy,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emporal Discounting in Kenya,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8, 101: 30-45.

⑤ Griskevicius, V., Ackerman, J. M., Cantu, S. M.,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Simpson, J. A. et al., When the Economy Falters, Do People Spend or Save? Responses to Resource Scarcity Depend on Childhood Environm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2): 197-205.

⑥ 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Henry Holt, 2013.

⑦ Inzlicht, M., & Schmeichel, B. J., What is Ego Depletion? Toward a Mechanistic Revision of the Resource Model of Self-Control,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7(5): 450-463.

⑧ 王琳:《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正常青年人认知控制能力的影响——一项 ERP 研究》,河北医科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⑨ Moeini-Jazani, M., Albalooshi, S., & Seljeseth, I. M., Self-Affirmation Reduces Delay Discounting of the Financially Deprived.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1729.